

# 【研讨会特辑】

## 2021 年中日教育研究学会 10 周年研讨会总结报告 《百年教育：中日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2021 年 9 月 26 日，中日教育研究学会成立 10 周年之际，举办了以《百年教育：中日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研讨会。最初计划在作为学会后援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的会场举办，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蔓延，改为由 Zoom 在线举办。得益于线上举办的便利，中日两国 100 多人踊跃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可十年来中日两国的教育及研究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讨论了中日教育研究学会作为教育和研究交流的桥梁，应如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并针对以及未来的研究和交流活动进行了讨论。

本次研讨会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使馆教育部公使参事官胡志平先生给研讨会做了开场致词，以及针对中国最新教育动向的演讲。胡志平先生的演讲涵盖了中国最新的教育政策，包括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并指出实现教育公平，特别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中国教育目前的首要任务。

然后，是东京福祉大学金龙哲教授以“‘无龄社会’可能吗？--‘百岁人生’中的教育体系设计”为主题的演讲。金龙哲教授是中日教育研究学会的创始成员并担任学会会长多年。金教授在演讲中，探讨了现代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现状、百岁新生活模式的设计以及老年人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最后，由现任会长、帝京科学大学吕晓彤教授以“中日教育研究学会在教育 100 年中的作用”为题进行了演讲。吕晓彤教授在介绍了学会在过去 10 年所做的努力之后，展望了学会未来的工作方向，以及学会作为日中研究交流的桥梁可以发挥的作用。

本次座谈会的主题“百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眼光及长期的努力。另一层含义，是以“百岁人生”的长寿社会为背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来设计人生，丰富人生，而建立一套有效的教育及学习的体系也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终身教育和学习体系涵盖了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等不同生命阶段。此外，重新整合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种教育体系，建立一个应对生理弱势和社会弱势群体等学习和福利问题的教育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从综合的视角，促进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同处于长寿社会的中日两国的合作，共同寻找对策。

基于这个想法，研讨会的后半部分聚焦活跃在中国和日本各个教育领域的年轻成员，围绕中日两国最新的教育形势进行了圆桌讨论。圆桌讨论主要围绕幼儿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环境教育、民族教育、医疗福祉教育等六大主题展开。这些课题都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领域，也是作为今后中日教育研究学会开展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后文由每个圆桌发起人对圆桌讨论作出详细报告。此次的研讨会共有 108 人参加，并有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相关领域的 20 余人专家为我们做了细致精彩的报告。

研讨会策划委员会：肖兰、李剑、董芳胜、吕晓彤

# 幼儿教育分科会报告

## 中国儿童政策的新动态

卢中洁（分科会主持人 发言人 浙江师范大学）

季瑞颖（发言人 御茶水女子大学）

刘佳（发言人 御茶水女子大学）

### 中国儿童政策的新动态

#### ——以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为中心——

卢中洁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婴幼儿的健康发展关乎万千家庭。《意见》一经发布，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门陆续推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方针纲领。3 岁以下婴幼儿的教育由此纳入了公众的视野，并且纳入了国家的教育和福利体系。因此，2019 年也被称为托育元年。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当前 3 岁以上托幼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9 年的毛入园率达到 83.4%，但与此相比，2019 年中国 0-3 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4.1%，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加盟国的平均入托率为 33%。0-3 岁托幼服务则可谓百废待兴，发展水平很低，远不能满足家庭的需求（和，2018）。

梳理近年关于国内 0-3 岁婴幼儿托育课程发展现状的文献，其方向多集中在 0-3 岁婴幼儿公共服务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师资管理对策方面（陈·胡，2008）。近年托育制度的改善和托育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渐得到了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工作迎来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蒋、佟、和，2017）。

但目前社会上在 0-3 岁托育事业的认知上依然存在着很多误区，例如，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对 0-3 岁婴幼儿过度潜能开发问题（陈、胡，2008）。异化

的托幼教育主要表现为内容超前、方式不当及评价偏离儿童发展的实际等(洪、陶, 2019)。还有一部分教育机构认为 0-3 岁和 3-6 岁幼儿之间差异不大, 把托儿班和幼儿班等同, 或是将 0-3 岁和 3-6 岁的保教工作一致化(于、李, 2014)。总体来说, 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3 岁后的儿童教育问题, 有关 3 岁前的儿童教育研究虽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有所增加, 但仍处于拓荒状态(王、刘, 2018)。值得关注的是, 日本 0-3 岁婴幼儿托育的实践经验近年在国内逐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魏(2017)梳理了日本幼稚园成立初期至今的保育服务政策变迁, 汇总了日本目前 0-2 岁托育服务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 0-2 岁托育服务政策做了对比, 强调了公共托幼理念建设的重要性。

笔者梳理了 2019 年以来托育服务的最新动态, 2021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三胎政策影响深远。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 中央政治局于 5 月 31 日召开会议,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可以看出, 调整人口结构是近年儿童政策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60 岁以上的人数较 2010 年第六次普查结果上升了 5.4%。2021 年 8 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继 2015 年第一次修订后实施了第二次修改。其中关于推动托育服务发展的支持措施为主要的修订点。新增的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条文如下: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综合采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 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第二十八条)

综上所述, 中国政府为发展托育事业, 已构建起财政、教育、就业、保险等各部门全力配合的立体化支援体系。基于人口结构调整的政策趋势也和近年日本推行的各项育儿支援政策的方针有共通之处, 这也是今后展开中日比较研究的重要领域。

## 参考文献

1. 和建花, 部分发达国家 0-3 岁托幼公共服务经验及启示[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8(5):109-116.
2. 虞永平, 杨凯红, 王乃正等. 关于托幼一体化的讨论[J]. 教育导刊: 幼儿教育,

- 2006 (3) :13-17.
3. 蒋永萍, 佟新, 和建花等. 0-3 岁儿童养育公共服务与政策支持探析. 中国人口报, 2017 年 1 月 23 日.
  4. 陈红梅, 胡秀玲. 0-3 岁早期教育的师资管理对策探析[J]. 教育导刊: 幼儿教育, 2008 (6) :32-33.
  5. 洪秀敏, 陶鑫萌.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 0-3 岁早期教育服务的政策与实践[J]. 学前教育研究, 2019 (2) :3-11.
  6. 于冬青, 李红岩. 日本“认定儿童园”制度探析[J]. 教育科学, 2014 (5) :87-91.
  7. 王磊, 刘晶波. 我国 0-3 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及分析[J].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版, 2018(1) :36-43.
  8. 魏晓会. 日本 0-2 岁保育服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7.

## 中国学前教育改革的动向 ——普及普惠性幼儿园——

季瑞颖

1990 年, 世界全民教育大会 (World Conference for Education for All) 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就“为所有人提供基础教育”达成了国际共识。会议将基础教育定义为“使人们能够获得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活动”, 包括了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非正规教育 (成人教育、扫盲等)。目前, 以 2030 年为期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中的教育目标提出“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并且在学前教育方面提出, 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男女童都能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国际上对于学前教育研究的经验表明, 对教育的投资越早, 回报率越高 (Heckman 2008), 发展学前教育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 也有利于促进终身学习,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有利于促进女性就业、发展国家经济、维持社会稳定 (OECD 2011)。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 其重

要性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义务教育的普及取得了重大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着手于学前教育的改革，致力于普及学前教育。

中国的学前教育改革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2010年至今处于跨越式发展阶段（董、刘 2021）。这源于2010年颁布的两个有关学前教育的重要文件，其一是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目标到2020年，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70%。其二是国务院201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意见》明确了学前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要以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特别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并且督促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编制适应本地发展情况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自此，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推进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内容。

在学前教育领域，“普惠性”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关于其内涵和定义在政策里面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目前我们所说的普惠性幼儿园一般包括了公办幼儿园、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和经过政府部门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看出“面向大众、收费较低”是其基本特征，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仍是一个摸索和探索的过程。为什么要发展普惠性幼儿园，从幼儿园发展的情况看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推进，1995年之后民办幼儿园逐渐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体。2009年数据显示，公办幼儿园仅占幼儿园总数的22.7%，因此仅依靠公办幼儿园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然而高质量的民办幼儿园大多收费高昂，其教育费用普通家庭无法负担。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教育资源短缺、一些地方“入园难”问题突出。在中国，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公益事业，强调其公益性，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幼儿园占比超过幼儿园总数的一半以上显然与“公益性”相悖（冯2010）。普及学前教育需要在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的同时发挥社会力量，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形式积极引导民办幼儿园向普惠性转换。因此需要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具体发展情况出台相应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

定标准、奖补措施、评价和监督制度。2020年版《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除“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之外，又新增了“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作为学前教育阶段衡量国民接受教育状况的指标。但是截至2016年仍有40%的省级政府部门没有制定出完善的认定标准（吕，2016）。有调查数据表明，在对于学前教育经费的分配和使用方面，奖补措施仍主要倾向于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没有得到很好的资金支持。长此以往，不利于民办幼儿园向普惠性转型，也不利于普通民办幼儿园提升教育质量。

为了了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实际发展情况，笔者于2019年走访了云南省普惠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根据对幼儿园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园长的采访中了解到，在云南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主要认定标准是收费，以不能超过公办幼儿园的1.5倍为基准。从走访结果看来，由于政府出资（补助）形式的不同，可以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分为“民办公助”和“公办民营”两种类型。其中“民办公助”较为普遍。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自主申请经过审查认定后向社会公示。有意向申请普惠性的多数是年检评价为“合格民办教育机构”的民办幼儿园。虽然在当时的认定标准中对幼儿园的规模、师资、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但在实际认定过程中主要认定标准为学费。因此，大多数有意愿转型普惠性的幼儿园在园所环境、设施、师资等方面还有待加强。此外，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紧缺，对于“民办公助”幼儿园的奖补措施还不到位，仍是以补助形式为主。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边境地区）奖补资金发放不及时，申请和发放间隔的时间长。教师方面，“民办公助”幼儿园普遍不能保障“两教一保”的教师配置标准，“两教轮保”形式较为常见，部分老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教师培训以园本培训为主。另一方面，虽然“民办公助”幼儿园在认定初期是以学费为主，但在取得认定之后政府对幼儿园质量的监管逐渐加强，在后期的审核中，除学费之外，在幼儿园管理、保教内容、教师资格、教师培训等方面都在逐步提高要求。

“公办民营”幼儿园是由政府出资兴建幼儿园，之后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园长，并配备编制教师（2名左右）。这一类幼儿园大多是新建幼儿园，因此在开园初期可能会面临缺少生源的问题，但因为从幼儿园建设伊始就接受政府监督指导，办园过程中又有优质公办幼儿园对口帮扶，因此在教育环境、师资、收费

等方面基本与公办幼儿园相当。生源问题在后期得以解决，甚至在开园 2、3 年后每年报名人数都会超过预期招生人数。之后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运营资金、教师培训、与家长和政府的信赖关系等。

中国于 2014 年提前完成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学前 3 年毛入园率的计划目标，截至 2020 年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达到了 85%。2021 年起教育部预计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目标在 2025 年实现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0%以上，并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也提出要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更注重提质。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学前教育发展质量也参差不齐。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仍需政府加强主导作用，增加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制定完善的制度标准，结合实际经验不断探索。

### 参考文献

1. 董海军, 刘海云. 中国学前教育政策的范式变迁及转型发展——基于 1949-2020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 学习与实践, 2021(08):125-133.
  2. 吕武. 当前省级政府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6(04):8-12.
  3. 冯晓霞. 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J]. 学前教育研究, 2010(05):4-6.
  4. OECD(2011)『OECD 保育白書人生の始まりこそ力強く:乳幼児期の教育とケア(ECCE)の国際比較』OECD[編著] 5. 明石書店(星三美和子、首藤美香子、大和洋子、一見真理子[訳])
- James J. Heckman (2008) “SCHOOLS, SKILLS, AND SYNAPSES” *Economic Inquiry* Vol. 46, No. 3, pp. 289 - 324

# 最近十年中国公共介入的“居家保姆”保育服务的政策动向考察

刘佳

## 1. 研究背景和问题意识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政府以促进经济、提高生产力和解放女性为主要目的，鼓励女性就业和参与社会事宜。其中，特别是在工业化水平高的大城市，政策上对于国营工厂、企业运营的公立、集体的“托儿所”等保育设施的设立进行了规定，私人领域的育儿开始委托给公共保育设施。但是，80 年代市场化改革开始以后，公共保育设施开始逐渐走向破产或者民营化。90 年代中期以后，公立、集体托儿所几乎消失了。从那时起，国家就开始从育儿领域撤退。随着提供公共保育、促进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这一女性解放的意义在政策中变弱，作为公共保育设施开始消失。“育儿”（尤其是 0-3 岁的婴幼儿的育儿）基本上都回归为私人家庭的责任，尤其是女性的责任。在城市的核心家庭，特别是双职工家庭中，在家庭不能完全实现育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亲属间的互助来保障家庭的育儿功能占很大的比重。不过，通过购买市场化的、由家庭以外的人或设施提供的、面向婴幼儿的照护、教育服务，来补充或代替家人的育儿功能，或者对婴幼儿早期教育进行投资的情况也不少。其中“居家保姆”保育服务（中国的婴儿照护服务）的利用十分普遍。

另一方面，从 2010 年开始，少子高龄化逐渐成为社会问题。以此为背景，特别是针对不满 3 岁的孩子，通过提供多样的保育服务来缓解少子化问题逐渐开始被广泛讨论。但是现在，围绕保育的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专业的集团保育设施不足，幼儿入园率极其低下，现在 3 岁以下幼儿的照护仍然是亲属互助以及居家保姆服务购买等非正式私人照护形式居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目光同时投向目前较为传统且被广泛利用的“居家保姆”家庭保育服务。并且，应该重视政府方面对“居家保姆”服务的（公共）介入、政策动向。

基于以上内容，本文通过对中国中央政府在 2010 年中国的“居家保姆”保育服务的宏观层面上的“居家保姆”保育服务相关政策的内容进行分析，讨论对“居家保姆”服务的公共介入动向。

##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对于 2010 年-2019 年在中国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关于“居家保姆”保育服务相关部分的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内容，进行政策分析，试图说明近 10 年政府对“居家保姆”服务的公共介入的动向变化。

## 3. 研究结果

从分析结果来看，到 2014 年为止，政府立足于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促进家庭关系消费和推动育儿关系经济，主要进行包括“居家保姆”在内的广义的“家庭服务业”的初步产业化和初步规范化。此类政策基本上作为经济政策的一环而提出的。在少子高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2015-2019 年，对于家庭服务业，政府在进一步促进“产业化”和“规范化”的同时，开始推进家庭服务业员工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体来说，最近十年间，对于广义的家庭服务业，国家介入的程度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开始从非制度化向逐步制度化迈进。

## 4. 考察

作为家庭的育儿功能和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角色的补充，“居家保姆”服务与孩子的第一次社会化、孩子的发展、家庭再生产、女性的社会参与等密切相关，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其他家务劳动服务补充和替代家庭家务劳动功能的特征。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体现在有关于“居家保姆”的政策文脉中，并且“居家保姆”也没有作为一项具有补充或者代替家庭育儿职能的特殊服务业对其进行政策上的特殊规范和公共介入。另一方面，虽然目前针对少子化提出了提供多样的保育服务来缓解少子化社会问题的方向，但是在作为关于多样性保育措施的一环的“居家保姆”保育服务，其相关政策的设立与缓解少子化相关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的关联并不紧密。其表现主要为在政策文脉中，“居家保姆”主要从供给的角度作为（1）促进城市就业、减少失业、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经济政策，（2）促进儿童相关消费、促进多样的家庭相关消费活动的经济政策。在政府公共介入较少，以及市场机制主要调节之下，“居家保姆”保育服务很难为

社会广泛阶层的育儿家庭使用。

在保障家庭职能和家庭再生产、促进男女平等的社会参与方面，如何补充或代替家庭育儿职能将是今后关注的重点，而“居家保姆”保育服务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也正因为以上特征，关于广泛的阶层中的育儿家庭的享有更加平等的机会获得高质量保育这一有关于社会平等的视角出发，对于“居家保姆”等育儿照护服务的公共介入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共支持应该得到政策上的重视。

另外，有关于照护方面，在社会福利以及保育研究方面，都开始重视家庭、亲属、地域内成员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以及集团照护之外居家或者在地域生活环境内的照护的可能性。也就是更重视社会关系网(social network)。在各方协作进行保育网络建立方面，日本先于中国开始进行探索。今后对于日本的保育社会网络的研究，也将对中国的多样性保育体系建立有所启示。

###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左际平、蒋永萍 《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3. 刘中一 〈从奶妈、保姆到育婴师：私人托育的历史演进〉 《河北学刊》 2020 第 20 卷（4） 2020。
4. 秦莉莉 〈保姆行业的现状、发展方向及其立法思考〉 《行政与法》 2006（3） 2006。
5. 潘悦达 韩德民 李星明 卢九星 〈我国育婴师从业及教育培训现状分析〉 《医学教育管理》 2017 第 3 卷（2） 2017。
6. 棕野美智子・藪長千乃 編著『世界の保育保障 幼保一体改革への示唆』 法律文化社 2011。
7. G. 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著 岡沢憲英・宮本太郎 訳『福祉資本主義の三つの世界——比較福祉国家の差異論と動態』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1。
8. 清水美紀 『子育てをめぐる公私再編のポリティクス』 勁草書房 2019。
9. 松木洋人 『子育て支援の社会学——社会化のジレンマと家族の変容』 新泉社 2013。

## 环境教育分科会报告

### 饮食教育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性

肖兰（北海道大学）

袁春红（岩手大学）

归山雅秀（北海道大学）

#### 引言

日本于 2005 年颁布了《饮食教育基本法》，提出了“饮食教育”的基本理念。该法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责任促进饮食教育，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积极推动此项措施。不言而喻，“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根据该法规定，饮食教育需被定位为“智育、德育和体育的基础，旨在培养能够实行健康饮食的国民，使人们通过各种经验，获得关于“食物”的知识和选择“食物”的能力。日本对“饮食教育”的重视，来自于食品安全问题、对外依存度问题、人们因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不良饮食习惯增多等与“食”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严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变化中，人们需要形成对“食物”的科学思考方式和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在促进城市与渔农村共存与对流，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振兴地方社区经济，传承和发展丰富的饮食文化，在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基础上促进粮食的生产和消费（重点标记为作者注）、提高粮食的自给自足等方面，饮食教育都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不仅日本，现在许多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应对这些与“食物”有关的问题，以满足人民对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需要，建立繁荣且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国近年来也参考日本的《食品教育基本法》，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先后制定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等，提出了健康国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另一方面，在人类世时代，人口的增加和活跃的人类活动正在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重大负担，造成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由粮食系统造成的（Crippa et al., 2021），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占粮食生产的 17%（UNEP, 2021）。2015 年 9 月，联合国峰会通过了

由 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制定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其中包含 17 个目标和 169 个对象）。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按照“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满足子孙后代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以保护地球环境，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和平繁荣和舒适的生活为目标，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入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而不断努力。换言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实现，不能局限于某个领域，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多学科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健康的饮食不仅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必不可少，而且对保护地球的健康也极为重要。迄今为止，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已经增强了关于“食物”作为对人体有益的“健康食品”的认知。然而，将“食物”从生产、分配到消费的过程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认识到其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负担的人还是极少的。在此背景下，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的兴趣，我们以人们所熟悉的“饮食教育”为出发点发起了这次分科讨论会。讨论会以“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粮食生产对地球的健康有重大贡献”为理念，对饮食教育的现状和全球变暖等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本次分科讨论会的主讲人和参会者大多是“国际饮食教育交流促进协会（Food Societ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ifestyle Education，以下简称 FSMILE）的会员。在演讲前，首先由 FSMILE 主席袁春红副教授介绍了 FSMILE 成立的目的是和工作概况。FSMILE (<http://fsmile.org/>) 成立于 2014 年，总部位于日本盛冈，并以日本鹿儿岛、福冈和中国上海等地为中心，积极推广日本的饮食教育理念，传承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FSMILE 从各种角度（食品营养、安全知识、烹饪方法、饮食方法、饮食文化、农业、流通体系等）向世界传播“饮食教育”，致力于培养饮食教育领域的人才和领导者，为促进国际饮食教育交流做出贡献。会员包括来自水产科学、农业、医学、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注册营养师、烹饪研究人员和食品相关企业代表等。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相互合作，对国际饮食教育进行研究和交流，并面向大众进行信息传递。

综上所述，本次分科讨论会首先讨论了饮食教育和环境教育作为“人类共同使命”所应发挥的作用，其后介绍了中国大学里作为通识教育课程(Liberal Arts)之一的饮食教育课程，以及 FSMILE 迄今已开展的饮食教育课程、国际烹饪班、“食育食全食美”和“亚洲厨房”等国际饮食教育实践活动。下面，我

们将简述每个演讲的内容，并深入讨论饮食教育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性。

## 环境教育和食品教育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归山雅秀

归山雅秀的开场演讲，主要基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科学研究数据，讨论了由于人口增长和活跃的人类活动所造成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减少，以及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的重大负担。

近几个世纪，是人类活动开始对地球产生显著影响的时代，被称为“人类世 Anthropocene”（Crutzen, 2002）。由于生物的大规模灭绝以及生物多样性显著减少（Wilson 1999），全球生态系统的恶化（Rockström et al., 2009）和全球变暖等生态变化，有学者主张人类已经进入了第六次大灭绝时代（Leakey & Lewin, 1995; Harari, 2011, 2015; Wilson, 201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 IPCC-WGI 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该报告断言“人类的影响使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是毫无疑问的”，并预言“至少到 2050 年气温将继续上升，本世纪的气温上升将超过 1.5-2.0° C（IPCC-WGI 2021）。从大约 250 年前到过去的 80 万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冰期期间几乎恒定在 180-200 ppm，而在间冰期期间约为 280 ppm。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增加，2020 年已经达到了 413.2 ppm（横山, 2018; IPCC-WGI, 2021）。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所引起的，其中粮食系统产生的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Crippa et al., 2021）。这其中，尤其是热带地区的牛牧场和油棕（棕榈油）林种植园对热带森林的破坏，加速刺激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Pendrill et al., 2019），与植物性食品相比，动物性食品的土地利用面积、用水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大得多，因此，对全球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WRI, 2016）。

Hawken（2021）指出，成年人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为 50 克/天，但当今人类的平均摄入量为 68 克/天，即过量摄入了 36%之多。另外，现今世界饥饿人口为 7.2-8.1 亿（截至 2020 年；FAO 2021），而肥胖和超重人口超过 19 亿（截至 2016 年；WHO）。另一方面，2019 年世界粮食浪费（food waste）多达 9.13

亿吨(占粮食总供应量 53 亿吨的 17%),相当于每人每年 121 公斤(UNEP 2021),粮食损失(food loss)比例高达 13.8%(FAO 2019)。在日本,粮食自给率(food self-sufficiency rate)低至 37%(卡路里换算),63%的粮食是利用海外的土地和水资源生产的,伴随粮食运输(food mileage)也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但另一方面日本每年粮食损失高达 600 万吨,即每人约 47 公斤(日本农林水产部,2021)。据研究推测,高度可行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 1,051 GT,其中与食品相关的为 211 GT,与土地相关的为 123 GT,共计 355 GT(占总量的 34%)可以通过改进食物系统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Hawken, 2021)。

综上所述,当前的人类饮食体系对个体的不平衡饮食和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社会的贫困、饥饿和肥胖以及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都有重大影响。

### 从解决环境问题和粮食危机看饮食教育

田元勇

田元勇同样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质”和“量”两方面指出了全球粮食危机,并探讨了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全球饥饿人口接近 6.9 亿,占世界人口的 8.9%(SOFI, 2020)。2020 年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更加严峻。也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越来越需要提高认识并进一步努力实现目标 2“消除饥饿”。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食品质量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根据《2018 年全球营养报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死亡与食物有关。

人类的膳食质量由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多样性、充足的数量、适度和总体平衡。从目前的饮食模式来看,谷物、水果、蔬菜和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因国家经济水平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动物性食物的消费包括牛、猪、鸡和鱼。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社会条件,1970 年至 2018 年人们的肉类消费量持续增加,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加(日本农林水产部,2020)。另一方面,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 2030 年饥饿人口将达到 8.4 亿(饥饿地图,WFP 2020)。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以肉类为中心的饮食模式不仅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福

利，动物大规模繁殖也会导致环境问题和动物福利问题，例如在恶劣环境中饲养的动物给动物造成的身心困扰。为了阻止这种趋势，田老师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健康饮食模式的普及（促进饮食教育）、扩大植物性饮食、减少粮食损失、提高粮食自给率（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等）。

## 通过大学通识教育推动饮食教育

梁佳

梁佳主要介绍了中国高校为促进青年身心健康和健康的饮食习惯而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开设的饮食教育课。

日本农林水产部 2016 年颁布的“第三次食品教育促进基本计划”中，指出新时期饮食教育的重点事项，是提高年轻一代对食品的知识 and 意识，实行促进身心健康的健康饮食。目前，不仅在日本，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通宵（电子游戏、聊天、狂欢）的频率正在增加。此外，随着快餐的流行，年轻人自身的健康也没有得到管理，尤其是饮食习惯紊乱导致的生活方式病增加，年轻时因过劳而死亡，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掌握正确的饮食知识，以及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中国大学生的饮食教育意识仍然偏低。基于这样的背景和对问题的认识，梁嘉在浙江海洋大学的文科课程的选修课中，开设了“日本饮食文化与饮食教育”课程。开设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在比较和学习中日饮食文化的同时，获得饮食教育知识，使学生能够对自己进行正确的健康管理。课程围绕饮食教育展开，涵盖了营养学、心理学、日本饮食文化和食品历史，世界饮食文化和环境教育等广泛的知识。梁嘉通过该课程参考日本饮食教育的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饮食教育指导。通过全面认识饮食教育的重要性，实践健康饮食，培养年轻一代丰富健康的生活。

中国高校专门开设饮食教育课程的还很少，可以说，浙江海洋大学开设的饮食教育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的先驱，期待未来会被更多的大学采用并普及。

## 实践报告：全球化饮食教育纳入青少年一代健康发展

王宇清

王宇清同样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着重关注青少年一代的身心健康发展，特别介绍了 FSMILE 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开展的饮食教育工作。

当前，日本随着少子老龄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和就业形势的迅速恶化，青少年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青少年面临的问题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当代这种需要不受传统智慧束缚的新生活方式的时代，需要正确的教育来帮助青少年正向面对现实、开拓未来。人们已经认识到，除了学校教育之外，通过志愿者活动、社会体验、自然体验和国际交流等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来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参与，获得与人、社会、文化和自然互动的丰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开头所介绍的，FSMILE 旨在培养和促进国际饮食教育交流。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们过上健康、愉快、充实的生活，FSMILE 从各个角度向世界传播“饮食教育”，培养国际化的饮食教育的人才和领导者。为实现这一目的，FSMILE 一直与社区合作积极举办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培养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在百岁人生的时代，教导青少年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在吃得美味的同时也了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培养具有国际交流和全球意识的青少年。

王宇清的演讲主要介绍了 FSMILE 定期举办的在线美食教育班、国际烹饪班以及“美食”国际研讨会等，并着重分享了最近开展的美食教育系列讲座《食育食全食美》和《亚洲厨房》的实践经验。从参与者的感想中发现，孩子们通过这次体验更加敢于接受新挑战，收获了良好的效果。

尽管此次分科研讨会汇聚了中日两国众多的教育研究人员和食品专家，但非常遗憾由于时间紧迫，没能针对百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培养未来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展开热烈而充分的讨论。以此为契机，还期待未来各领域的人们有机会从多种角度进一步交流。

### 结语

在中国和日本，“饮食养生”和“医食同源”这两个词由来已久。意思是

说，治病和饮食，本质相同，都是保持健康和滋养生命不可缺少的。另外，人们常说，“食”字是由“人”和“良”组成的。正如日本《食品教育基本法》（2005年）将食品教育定位为“智育、德育、体育的基础”，“食”是人的生命之本，培养“饮食的能力”即为培养“生存的能力”，贯穿人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

日语中的“粮食”的意思是“生命之粮”。在饭前说“感谢款待，我开吃了（いただきます）”是日本人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行为。这其中包含了“感谢你的生命”之意，表达了日本人对食材的感谢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从古至今，人类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大自然的恩惠。生态学中的“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所表述的意思是说我们地球上的食物和水等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通过充分了解地球和自然的承载能力来进行明智的，可持续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健康的饮食习惯”需要的是人类和地球双方面的健康。因此，从教育层面来看待食物和地球的健康时，“环境教育”和“饮食教育”可以看作是协同效应的共同使命。可以从生态学中的层次结构（个体→人类社会→生物圈→全球生态系统）对这一课题进行建模（如图1所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不让任何人掉队”这一目标，必须重视“健康的人类和全球生态系统”，以便智人（*Homo sapiens*）在这个星球上健康地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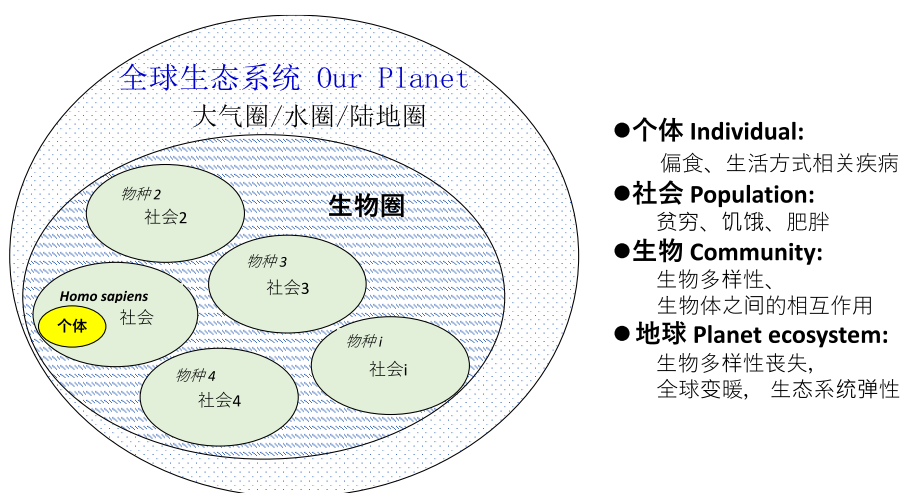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教育与饮食教育的协同效应“饮食与全球健康”

## 参考文献

1. (美)エドワード・O・ウィルソン『人類は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へ行くのか』  
齋藤隆央訳 化学同人 東京 2013.
2. 農林水産省「知ってる?日本の食料事情 2020 〜日本の食料自給率・食料自給力と食料安全保障〜」2020  
([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attach/pdf/panful-41.pdf](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attach/pdf/panful-41.pdf)) 最終閲覧日期 2021-11-29.
2. 農林水産省「食品ロス及びリサイクルをめぐる情勢」2021  
([https://www.maff.go.jp/j/shokusan/recycle/syoku\\_loss/attach/pdf/161227\\_4-194.pdf](https://www.maff.go.jp/j/shokusan/recycle/syoku_loss/attach/pdf/161227_4-194.pdf)) 最終閲覧日期 2021-11-28.
4. (美)ポール・ホーケン『ドローダウン 地球温暖化を逆転させる 100 の方法』江守正多訳 山と溪谷社 東京 2021.
5. 横山裕典『地球 46 億年 気候大変動』講談社 東京 2018.
6. Crippa M, Solazzo E, Guizzardi D, Monforti-Ferrario F, Tubiello FN and Leip A. Food systems are responsible for a third of global anthropogenic GHG emissions [J]. *Nature Food*, 2021, 2(3):1-12.  
<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1-00225-9>.
7. Crutzen PJ. Geology of mankind [J]. *Nature*, 2002, 415: 23.
8. FAO.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9.  
(<https://www.fao.org/3/ca6030en/ca6030en.pdf>.) 最終閲覧日期 2021-11-28.
9. FAO.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1.  
(<https://www.fao.org/3/cb4474en/online/cb4474en.html>.) 最終閲覧日期 2021-11-28.
10. Global Nutrition Report 2018  
(<https://globalnutritionreport.org/reports/global-nutrition-report-2018/>) 最終閲覧日期 2021-11-28.
11. Harari YN. *Sapiens* [M]. Vintage, London 2011.
12. Harari YN. *Homo deus* [M]. Vintage, London 2015.
13. IPCC-WGI.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1/downloads/report/IPCC\\_AR6\\_WGI\\_Full\\_Report](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1/downloads/report/IPCC_AR6_WGI_Full_Report).) 最终阅览日期 2021-11-28.
14. Leakey R and Lewin R. *The sixth extinction* [M].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95.
15. Pendrill F, Persson UM, Godar J, Kastner T, Moran D, Schmidt S and Wood 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rade drives large share of tropical deforestation emission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9, 56: 1-10.
16. Rockström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J]. *Nature*, 2009, 461: 472-475.
17. UNEP. 2021. Food waste index report 2021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unep-food-waste-index-report-2021>).
18. WHO. Obesity and overweight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 最终更新日期 2021-6-9.
19. Wilson EO. *The diversity of life* [M]. W.W. Norton, New York 1999.
20.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ハンガーマップ 2020  
(<https://ja.wfp.org/publications/hankamatsufu-2020>) 最终阅览日期 2021-11-29.
21.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SOFI) Report 2020.  
(<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state-food-security-and-nutrition-world-sofi-report-20201601686121.1638175406>) 最终阅览日期 2021-11-29.
22.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imal-based foods are more resource-intensive than plant-based foods. 2016.  
(<https://www.wri.org/data/animal-based-foods-are-more-resource-intensive-plant-based-foods>.) 最终阅览日期 2021-11-28.

# 高等教育分科会报告

## 中日高等教育最新动向及展望

刘国彬（福山大学）

###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如何创设整体育人环境，确保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同时建设创造型的高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紧要课题。

首先，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问题，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探索了诸多形式的通识教育，书院教育的方式便是其中之一。日暮友子以“中国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改革趋势-以书院教育为视角-”为题，阐述了现代的书院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改革发展趋势中的地位，探讨了现代的书院教育发展如何影响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式和内容，以及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开发创业的能力，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是高等教育的又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中国科学技术部于2011年11月8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女性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力培养女学生的科学兴趣，扩大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就业机会，加强女性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参与科技管理与重大政策咨询，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加大对女性科技人才的激励和保障，加强对女性科技人才资源的统计和评估，努力营造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sup>1</sup>。同时，日本于1999年推出“第1次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之后，先后共推出了5次该法律，尤其是第2次的“推进和扩大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学习”，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增加女性在领导层的比例等<sup>2</sup>。大滨庆子从国际比较的视点出发，以“创

---

<sup>1</sup> 科学技术部“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 (2021年12月10日阅览)。

<sup>2</sup> 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https://www.gender.go.jp/about\\_danjo/law/index.html](https://www.gender.go.jp/about_danjo/law/index.html) (2021年12月12日阅览)。

新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理工科女生的培养”为题，指出发达国家理工科女性科技人员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日本女性科技人员的比例更低。与之相反，中国理工科领域的女性人才培养速度和比例都高于日本。大滨庆子的发言，从推动高等教育多样性（diversity）的角度，探讨了女性科技人员的现状和培养问题。

再次，关于大学的第二外语教育。目前日本的大学除了英语之外，都开设有第二外语（或称为“初修外国语”）。第二语言习得目的是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进行培养，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着眼全局的能力，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便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郭春贵以“日本的大学的第二外语教育”为题，指出了日本的大学第二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郭春贵认为，多样化社会需要多样化的外语，日本的大学不应该英语一边倒，应加强亚洲语言的教育，必须对第二外语教学进行改革与创新，站在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视角总览第二外语教育、包括加强高中阶段的第二外语教育，同时增加学生去国外留学的机会。郭春贵的发言，从国际化和宏观角度探讨了第二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对策与建议。

最后，关于留学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历来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留学生的流向，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反映了该国的开放程度，高等教育的质量。王报平以“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招生质量问题与对策”为题，介绍了来华留学生发展状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国。可是，同时出现的是留学生招生质量问题，王报平认为解决来华留学生招生质量问题应进一步把好招生入口语言关，适时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审核评估等。

综上所述，本次高等教育分科会所探讨的内容，均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本次分科会的四位发言人分别介绍了通识教育、女性研究者培养、第二外语教育、留学生教育的最新动向及展望，展现了四个方面课题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各种独到的见解，下面是四位发言人的发言提纲。

## 中国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改革趋势

### ——以书院教育为视角——

日暮友子（日本大学）

日暮友子在本次报告中，参照日本的情况，首先确认了现代的书院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改革发展趋势中的地位。之后，探讨了现代的书院教育发展如何影响大学的通识教育方式和内容。通过这些考察，探索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水平各异的学生升入大学。虽然学生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为了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需要重新考虑进一步加强侧重于专业教育的大学教育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关注的举措之一是通过学生宿舍进行教育。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升入大学后要离家住在大学“学生宿舍”里。纵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学生宿舍可以说是为了学生在大学里拥有稳定的生活场所而发展起来的。但是2000年以后，学生宿舍不仅进入了为学生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功能的视野，还给学生宿舍增加了教育功能。例如，通过在宿舍的共同生活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在一些大学，学生宿舍超出了只作为生活的场所的意义，也被视为大学教育的场所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学参考中国传统书院和欧美寄宿制学院的教育方式，“学生宿舍”的名称也已经改为“书院”，从现在一些大学引入的书院教育情况来看，有的是精英式的，有的是选拔式的，有的是面向全体学生式的，书院教育的方针理念、规模、内容、规模、对象等根据各大学情况不同而各异。

## 创新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理工科女生的培养

大滨庆子（神戸学院大学）

大滨庆子对于创新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理工科女生的培养状况以及中日两国研究者协助等问题，从性别和国际研究的视角进行了比较和深入探讨。

目前，随着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市场环境多变复杂，高学历人群不

断增多，如何培养和确保创新人才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话题。推动多样性（diversity）是促进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是如何使女性科技人才充分发挥能力尤为重要。但是国际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理工科女性科技人员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日本女性研究员的比例还要更低，这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020年8月，日本文科省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有的媒体也报道称，除了经济领域外，科技领域也进入中美两强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科技人力资源中，女性比重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个现象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密不可分。此外，2015年中国女药学者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消息鼓舞了广大女性研究人员。由此可见，中国理工科领域的女性人才培养速度和比例都高于日本。在日本“男生选理科，女生选文科”的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女学生的专业取向，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几乎没有这种刻板意识，也没有嫌弃数学和理科的情况，并对中日之间产生这种差异进行了探讨。

## 日本的大学的第二外语教育

郭春贵（广岛修道大学）

日本的大学第二外语教育(以下简称二外)有第一和第二外语之分:一般英语属于第一外语,汉语、韩语、德语、法语等属于第二外语。另外,有必修、选择必修或自由选修:一般大学第一外语的英语皆为必修,而且多是必修6-8学分。而第二外语则因大学、学系、学科的不同,有必修、选择必修或自由选修。20年前许多大学都规定二外是选择必修(即必须从几种二外语言中选修一种)一周两节课,最少得选修四个学分。可是最近大多数大学都降为一周一节课,只需选修两个学分即可。第三,专任教师极少:大部分大学里的二外专任教师极少,几乎80%以上的二外课都是聘请临时的非专任教师来担任。第四,各班学生人数较多:语言课重在训练,人数不宜多,可许多大学为了节省非专任教师费用,不开太多二外班级。结果造成每班学生人数都超过30名,甚至有些大

学每班多至 50-60 人，根本无法进行语言训练。第五，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学会从 2002 年成立，一次也没有针对大学二外汉语教育的专题进行讨论过。

那么，大学需要二外教育吗？首先，世界各国大部分大学的二外教育都是自由选修，几乎没有选择必修的。日本的大学的二外实行选择必修方式，这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很少见。日本的大学二战之后设定二外必修课，原本是帮助学生衔接进入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可是时代的变迁，学生学习能力的下降，二外的教育结果已无法实现该目的。其次，从日本的大学的网页上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大学都标榜“培养学生的地球视野和对异文化的理解”。可是现实情况根本无法达到此目标，所以有人提出大学二外教育没有必要的看法。而且，日本 18 岁人口减少，大学生源下降导致经营大受影响，许多大学都在删减一些选修课，首当其冲的就是二外课。以致现今许多大学的二外学分减少了。另外，日本媒体只重视英语而忽视其他外语，造成社会对二外的需求不高。

大学需要二外教育的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赞成大学需要二外教育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多样化社会需要多样化的外语。第二，许多学者认为大学教育不是专业教育，是通过各种学科培养学生的知识和学习能力。外语只有英语是不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教育。第三，所谓国际化并不只是英美化，日本除了英语，更应该学习和了解亚洲的语言和文化。第四，语言教育因为班级学生人数少，更能训练学生的记忆力、集中能力、交际能力以及对异文化的理解。除了英语，再加上二外的训练，效果会更高。

关于二外教育的未来。从世界与国家视角从事二外教育：虽然由于媒体的影响，社会对二外的要求极低，但日本政府必须从世界与国家的视角来培养年轻一代的国际知识与修养。第二，处理学生水平下降的问题：学生水平下降，更应该通过二外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思考、交际等能力。二外教育不能局限于语言、必须通过学习语言，教导文化、人生等知识。二外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第三，增加国家支援大学的财政力度：国家必须资助大学的二外教育经费，让大学能够设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学科与科目，能聘请更多专任教师负责二外教育，能提供奖学金让学生去国外留学等。第四，跟高中二外教育密切配合：支持高中开设二外课程，与学生的高中教育密切配合，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所修二外学分，让学生觉得学习二外有前景有好处。

## 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招生质量问题与对策

王报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报平首先介绍了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可以总结以下几点：首先是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489,200名，与2000年的52,150名相比，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地国<sup>3</sup>。其次是生源结构不断优化。生源国家和地区日趋多元化，2016年达到了205个国家和地区。亚洲生源始终是主体，非洲生源增速最大，“一带一路”沿线生源逐年增加。第三是学习层次有所提高。学历生上升至2016年的47.4%，已接近来华留学生总数的一半。第四是学习专业趋于多元化。来华留学生学习的专业（类）共计14个，其中来华留学生达到或超过5,000名的专业（类）就有11个，汉语言类专业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比例降至38.2%<sup>4</sup>。

但是，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存在着招生质量问题。其表现是，第一，在机制方面缺乏质量意识，缺乏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质量甄别体系，缺乏质量审核机制和惩办机制，缺乏质量审查的工作方法、技术、手段和各类招生支持系统，招生信息支持方面问题突出；第二，在外在环境方面，固化的全球学生流动路径、标准化的大学排名机制、中国早期功利化的研究生招生策略等，也是导致来华研究生招生质量问题发生的重要方面。招生质量不高，导致各类留学生奖学金投放效率偏低，来华留学生招生与本土生招生质量差距加大，留学生入校后趋同化培养目标落空，以留学生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而不强、国际化战略招致“金元外交”等诟病，并引起国内民众对于来华留学生招生造成教育公共资源浪费、对本土高校招生存在公平冲击等各类舆情关注<sup>5</sup>。

---

<sup>3</sup> 陈宝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2017年10月22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7nztzl/2017\\_zt11/17zt11\\_yw/2017\\_10/t20171024\\_317275.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7nztzl/2017_zt11/17zt11_yw/2017_10/t20171024_317275.html)（2021年4月10日浏览）

<sup>4</sup> 程健维, 刘方远〈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年第8期, 第220-221页。

<sup>5</sup> 刘进〈来华研究生质量因何不高? —基于结构-功能-环境的视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12期, 第53-54页。

最后，王报平提出了解决来华留学生招生质量问题的对策。即，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规范，强化汉语基础，把好招生入口语言关；出台标准规范，加强留学教育机构的资质认证，适时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审核评估；加强全城或全区域的战略规划和管理，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系统成效和显示度，消除公众质疑<sup>6</sup>。

## 结语

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高等教育也应与时俱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质量的保障问题，高等教育不但要提供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则势在必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及创新问题，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适应时代要求更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大力开展第二外语教育非常有必要；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留学生的接受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次分科会所提出的四个发言要点，均为顺应时代发展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展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极其拥有参考价值。

---

<sup>6</sup> 蔡宗模, 杨慷慨等〈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到底如何——基于C大学“一带一路”来华留学教育的深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第111-112页。

## 终身教育分科会报告

### 终身教育视角下探索学习的本质-以中日两国实践为例-

杨映雪（东京大学）

刘梦思（东京大学）

詹瞻（东京大学/荻原美术馆）

倪琳林（东京大学）

#### 引言

一般而言，终身教育是指人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教育的总和，既包括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也包括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随着百岁人生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终身教育有助于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终身教育的理念包含三个重要概念：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和终身学习。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教育思想家保罗·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中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推动下成为了当代教育最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研究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该报告揭示了学习化社会的重要概念，强调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实现教育民主化的重要性，这对当代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2003）。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入终身教育的理念，是亚洲中较早开始推进终身教育实践的国家。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了《关于终身教育》的咨询报告；1988年，日本文省部新设终身学习局，标志着日本将终身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1990年，日本颁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法》，为终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周，2016）。经过近60年的发展，日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值得借鉴。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导入终身教育的概念。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终身教育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学分银行的建设打破了传统学历认证的壁垒，以成果积累和转换的方式为终身学习提供支持；社区教育的蓬

勃发展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更成为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中国的终身教育不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其重要概念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政策性文件当中，彰显了国家对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视和大力推进终身教育的决心。同时，一系列的制度化建设及政策立法举措也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终身教育正走向政策化、法制化的深化阶段（吴，2016）。

可以说，终身教育不仅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教育理念之一，也是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如何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人人都能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共同课题。在过去，教育理念一直侧重于对学习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如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凸显了创新驱动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要求我们转变教育观念，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同时也要重视综合素养和精神层面的提升，以适应百岁人生时代的到来。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时代，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未来教育应该如何发展，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本分科会围绕“终身教育视角下探索学习的本质”这一主题，邀请到来自东京大学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和浙江省获原美术馆公共教育部负责人，从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教育实践出发，分别从课堂里的教学改进、馆校合作下的儿童美育、以及疫情背景下的线上学习这三个角度，就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完善人格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本文根据中日教育研究学会十周年研讨会终身教育分科会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 自主学习者的培养

--以课堂笔记的有效使用及其指导法的中日比较研究为例--

刘梦思

近年来，随着新教育目标(Competency; OECD, 2015)的提出，各国也相继出台各项政策进行教育改革。例如，在中国，为了明确适应终身学习和社会发展的素质与能力，教育部提出了培养“核心素养”的政策（教育部，2014），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学会学习”的能力，即能够根据不同的学习环境选择和调

整相应学习策略的能力。然而，今年刚刚公布的“双减政策”强调了学校作为教育主要场域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减少对课外教育机构依赖的同时，亟需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因此，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质量，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迫在眉睫。

在日本，为了培养新时代所要求的素质和能力，文部科学省（2017）也大力倡导改进课堂，以实现“主动的、互动的、深度的学习”的教育目标。然而实际上，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部分，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学习状况如何呢？根据日本倍乐生教育综合研究所（2015）针对小学及初高中生的“基础学习调查”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哪门科目，学生在课堂理解度上的表现都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其中，对于高中数学课堂的理解，回答“基本上听懂了”或者“听懂了大约 70%”的学生人数不到一半。为何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理解度如此之低？为了探讨其中原因并寻求改善方案，笔者把目光聚焦到了学生们在课堂上的主要活动之一：课堂笔记。

笔者通过总结以往的研究发现，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课堂笔记是促进课堂学习的重要学习活动之一(e. g., Peverly et al., 2003)。然而，问题在于学生可能无法有效地自主地进行这项活动。例如，许多学生只是逐字逐句地抄写老师提供的信息(Mueller & Oppenheimer, 2014)；也有学生认为“做好看的笔记就是学习了”（柴，2018）。此外，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高中生，都有不少学生属于“被动型做笔记”（Liu, 2021）。由此可以推断，尽管两国的学生在日常都使用课堂笔记，但他们记笔记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地帮助他们理解课堂上的内容。

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对做课堂笔记的指导是怎样的呢？在中国，大部分教师相对缺乏对指导课堂笔记的重视(e. g., 王, 2014; 陈, 2000)。在日本，教师会指导学生如何做笔记，也会注重他们的板书写得如何。然而，就教师的指导内容而言，研究发现（魚崎，2017）从小学到高中，大部分学生都被要求做好“便于课后复习”、“多写点”的笔记，注重笔记的“量”而非“质”，指导方法也偏抽象而非具体。此外，笔者（Liu, 2021）也以中日两国的高中生为对象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教师对课堂笔记的不科学指导，反而会促使学生产生对学习不太有效的笔记活动。因

此，有必要探讨教师应该如何给予科学和有效的笔记指导。目前，所属研究团队正在通过以培养自主学习者为目标，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个别指导学习支援活动，即“认知咨询”（市川, 1989）的实践，来探求怎样的笔记指导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去自主地进行更有效地学习。

## 中国地方型美术馆与馆校结合中鉴赏教育的运用

詹瞻

自 COVID-19 爆发以来，疫情带来了全球性生活构造的巨大改变，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同样也在此名单之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 2020 年的研究证实，疫情期间，全球近 9.5 万家博物馆机构中，有近 95% 的机构曾处于闭馆状态，更有近 13% 的博物馆面临永久性关闭<sup>7</sup>。后疫情时代下，作为社会复原力的美术馆公共教育成为了引领公共沟通，治愈彼此心理创伤的有效方式之一。由此，教育方式的变革让美术馆公共教育从馆内教育走向馆外，带来了馆校结合等模式的场域转变。并且，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也由原先单一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即是教育参与者也是教育活动者的、作为符合疫情时代下的个人成长型的尝试者。这种转变带来了新教育模式的实践和创新。

其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我国目前的教育观念以及内容相对落后，缺少对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急需深化教育改革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再次提到“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教育方式，引导回归育人本原的教育发展方向，突出了教改由原本的知识偏重型转变为人格完善型，核心重在丰富学生的人性教育，拓展其精神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自主认知和体验感知。而这一点也正与首段中提到的美术馆教育模式的转变相契合。美术馆教育相较于当前的学校教育而言，更加注重于自由的感性认知，其教育理念可

---

<sup>7</su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关注新冠疫情对全球博物馆的影响〉2020-05-18

（<https://zh.unesco.org/news/jiao-ke-wen-zu-zhi-he-guo-ji-bo-wu-guan-xie-hui-guan-zhu-xin-guan-n-yi-qing-dui-quan-qiu-bo-wu>）最终浏览日期 2021-12-15。

以追溯至赫伯特·里德<sup>8</sup>（Herbert Read, 1893-1968）提出的艺术教育理论“Education Through Art”（通过艺术的教育）。里德认为艺术教育的核心绝非艺术知识的单向传递，而是基于对人的天性的认识，艺术不仅创造了物质的文明，更是一种认识方式，是思维的主要部分。艺术应成为教育的基础，并非与科学教育相对而立，是促进学生学思结合、协调个人的独特性与社会统一性平衡的方法。由此看出，国家教育方针与美术馆的育人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侧面引出了人才培养可能的变革方向。

再者，尤其在中国美术馆各地不断激增的当下，从地方美术馆个体的实践角度，笔者以所在的荻原美术馆为例，探讨美术馆在儿童美育上新的尝试。美术馆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内作为全市首个针对儿童的当代美术馆，公共教育中引入视觉化思维策略（Visual Thinking Strategy）<sup>9</sup>这一鉴赏方式，通过围绕对艺术作品参与者相互之间对话式的鉴赏，由被动式的学习引导自主性观察，从而提升学生的判断性思维、创造力、合作力以及交流力等非认知能力。同时也将该方式投入与附近学校、幼儿园的馆校合作项目中，课程实施后可以明显发现，学生通过相互的对话交流更愿意积极地构建艺术作品的意义，而非消极接受信息，并且参与者在之后的来馆参观中有更为主动的参观态度。

最后，作为今后的课题，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学校教员与美术馆教育工作者之间对于学校美术教育与美术馆教育功能区别上的理解，相信将会让馆校结合的整体融合走得更远。

## 线上自习室：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终身成长社区

倪琳林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改变了很多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模式，也给国际学生流动造成了影响。笔者和大部分留学生一样，不得不选择网课的方式开启自己漫长的“远程留学”之旅。随着日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限制不必要

---

<sup>8</sup> 赫伯特·里德，20世纪英国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及哲学家。《Education through Art》成书于1993年，于1977年由吕廷和翻译为《通过艺术的教育》，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sup>9</sup> 1980年代由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当时的教育部部长 Philip Yenawine 和认知心理学家 Abigail Housen 团队共同开发的一套艺术作品分析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

不紧急的外出后，一项线上自习室的教育实践也拉开帷幕。该实践项目由在日留学生（笔者）发起，面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学习者，旨在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自习空间。线上自习室每周开放七天，早晚两次，每次约持续 2~3 个小时，即使周末也从不间断活动。截止发稿为止，这个在疫情下诞生的线上自习室已经成立了一年半之久。它成为了参与者自主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也逐渐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共同体。本文通过对“学习如何学习——线上自习室”这一案例的分享和反思，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下如何建立一个基于终身学习视角的学习型社区。

所谓线上自习室，是指学习者借由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就能模拟在学校或图书馆等真实场景下的自习氛围。近年来，在疫情的影响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线上自习室孕育而生。目前在中国，主要有 b 站、钉钉、腾讯会议等平台上运营的线上自习室，也有专为手机用户设计的打卡自习 APP。在日本，主要有免费和付费两种线上自习室。前者主要由志愿者管理，借用 Zoom 或 Skype 等平台模拟自习环境。而后者则增加了为 K12 学生提供在线学习指导的服务，多由课后补习机构运营和授课。可以说，尽管线上自习室的市场需求大，但其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各类自习室的水平也层次不齐。那么，本案例中的线上自习室又有怎样的特点值得借鉴呢？除了满足疫情下的学习需求外，线上自习室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社区呢？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终身学习型的线上自习室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学习者的多样性。由于该自习室具备线上、免费、多时段等特点，除了吸引到在家学习的学生之外，也可以看到下班后需要继续学习的社会人，和周末带孩子在自习室里一起看书、绘画的家长。自习室创立之初以留学生居多，随着口碑的建立逐渐吸引到了越来越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加入。截至今年 12 月，线上自习室持续了 585 天以上，参与者约 300 人，居住地覆盖全球，参与超过 7000 人次（早晚分别计算）。此外，登记线上自习室的人数也累计超过 400 人。

其次是学习内容的丰富性。一般来说，传统的自习人群大多为备考考生，其学习带有明确目的和备考压力。然而，在本案例中却可以看到很多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内容。比如，有不少身兼数职的“超人”妈妈，在每日繁忙的

工作或育儿生活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写作的习惯；也有小学生会跟着家长一起自习，进行绘画创作、制作机器人等兴趣活动等等。可见，在这个自习室里，无论是自我提升的学习，还是兴趣爱好活动，都被鼓励和看作是一种“学习”。

第三个特点是通过互动形成学习共同体。该线上自习室设有15分钟总结环节。经过多次实践，笔者观察到参与者分享的内容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讨论。这不仅促进了对彼此的了解，也通过向他人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获得了认同感和满足感，增强持续学习的动力。自习室的发起人谈道：“刚开始组织线上自习室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坚持这么久，更没想到通过线上自习室可以认识那么多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每一次都能通过大家的分享学习到新的知识。这样的形式不仅可以让学习者及时反思学过的内容，更能汲取新的知识和能量”。在这个空间里，学习不再是一种单独的行为，而是一种互助和陪伴。学习者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由屏幕和电脑摄像头组成的二维空间，而是一个通过反思和对话形成的更加立体、真实的场域。

综上所述，线上自习室在多次实践中逐渐形成为了一个有机的学习共同体。该自习室的组织者谈到：“虽然大家的家庭背景、所在地区、职业和学习目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大家都是持续学习且愿意分享的终身成长型的人。”这正是该线上自习室的独特魅力，也是它能不断“成长”的奥秘。期待未来它能够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终身成长型的学习社区。

##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随着百岁人生时代的到来，建设一个更加多样化、更具包容性、保障人人都能终身学习的社会非常重要。同时，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教育理念。本分科会紧紧围绕此次研讨会的主旨“面向百岁人生时代的教育”，并结合分科会的主题，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探讨了适应未来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

分科会发言人首先分享了中日两国的前沿教育实践，并就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性和完善人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例如，东京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生刘梦思分享了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中日比较研究，在如何进行课堂教

学改革、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同一所大学的硕士生，同时也是“学习如何学习”项目的发起人倪琳林生动地介绍了线上自习室的创办经历以及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并深刻总结了自己的学习经验。通过她的介绍可以发现，学习者在自我成长和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中形成了学习共同体，而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学习者个体的成长，两者相辅相成。此外，获原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詹老师则介绍了儿童美育的最新实践。通过在美术馆的公共教育中引入互动和对话式的美术鉴赏，能够帮助提高儿童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合作和沟通等非认知能力。这一新的美育实践不仅体现了当代美术馆公共教育理念的转变，符合回归育人本原的国家教育方针，也更凸显了美术馆公共教育在完善人格、提升素养、引领公共沟通和复原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上述三位发言人的分享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美育实践，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的学习，都体现了从传统的传授知识到“主动式、对话式、创造式”的教育理念的转变，并且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才能促进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在最后的提问交流环节，詹老师也提到“当代美术探讨的议题远不止艺术，涉及到各个领域，可以是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物学，也可以是信息化社会的编程。今后美术馆的教育工作更需要有深度自学能力，不断愿意创新探索的综合人才”。可以说这不仅体现在美术馆教育的领域，疫情带来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也对今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专业素养的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是社会建设的基石。个体不学习的社会，是放弃自我革新的社会”（牧野笃，2019）。学习的本质不仅是对书本知识和技能的吸收，更是实现个体的人格完善、人际互动和社会革新的路径。只有在终身教育这一理念下，我们才能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战略，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召集人杨映雪谨代表分会向中日教育研究会会长吕晓彤老师、事务局长董芳胜老师、大会负责人肖兰老师和李剑老师、以及各分科会发言人和与会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为年轻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术交流平台。也衷心希望本次会议的发言内容能有助于今后学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教育的交流。

## 参考文献

1. 陈金忠 〈谈学生课堂笔记的指导〉《山东教育科研》2000（Z2）：123.
2. 杜彬恒, 陈时见 〈我国教育战略规划的基本特征和价值理念—基于我国五个纲领性教育文献的政策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3）.
3. 高志敏 〈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理念的思考〉《教育研究》2003（1）.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调研组 〈关于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研究报告〉《新形势下博物馆工作实践与思考》文物出版社 2010：70-71.
5. 黄坤 〈中国博物馆教育十年思考与实践〉《中国学术期刊》2017.
6.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4-04-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_j\\_kc\\_jcgh/201404/t20140408\\_167226.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_j_kc_jcgh/201404/t20140408_167226.html)) 2021-12-15 浏览.
7. 刘旷 〈字节跳动、学而思纷纷进场, 线上自习室 2021 更火了?〉2021-01-15  
(<https://www.forbeschina.com/investment/53397>) 2021-12-15 浏览.
8. 马丽华, 娜仁高娃, 牧野笃 〈如何应对少子老龄化: “小型社会”的构建与“学习”的再概念化——访日本东京大学牧野笃教授〉《开放教育研究》2019（6）.
9. 王存国 〈浅谈数学的课堂笔记〉《基础教育》2014（1）：144.
10. 吴遵民 〈终身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 37 年终身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6（1）.
11. 郑奕 《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20.
12. 周俊华 〈终身教育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教育学术月刊》2016（4）.
13. 市川伸一「認知カウンセリングの構想と展開」『心理学評論』1989（32）：421-437.
14. 文部科学省「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平成 29 年告示）」  
([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micro_detail/)

- \_icsFiles/afieldfile/2018/05/07/1384661\_5\_4.pdf) 2021-12-15 閲覧.
15. 日本ベネッセ教育総合研究所「学校での学習」『第5回学習基本調査データブック (2015)』  
([https://berd.benesse.jp/up\\_images/research/5kihonchousa\\_datebook\\_2015\\_p04-09.pdf](https://berd.benesse.jp/up_images/research/5kihonchousa_datebook_2015_p04-09.pdf)) 2021-12-15 閲覧.
  16. 柴里実「つまずきを克服する『まとめノート』による学習力向上」『2018年度学習支援事例集—自立的な学習者を育てる認知カウンセリングの実践—』2018: 36-52.
  17. 魚崎祐子「大学生によるノートテイキングとこれまでに受けた指導」『玉川大学教育学部紀要』2017 (17) : 173-185.
  18. Liu Mengs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ents about the lecture note-taking strategies”, 3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ague, Czech Republic, July 2021.
  19. Liu Mengsi. “Lecture Note-taking Factor Analyses: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ents’ Strategies in Math Clas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JURE 2021 Conference, August 2021.
  20. Mueller, P. A., & Oppenheimer, D. M. (2014).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keyboard: advantages of longhand over laptop note tak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6), 1159 - 1168.
  21. Peverly, S. T., Brobst, K. E., Graham, M., & Shaw, R. (2003). College adults are not good at self-regul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regulation, note taking, and test tak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5(2), 335 - 346.

## 民族教育分科会报告

### 民族教育研究的最新趋势 ——传统寺院教育、民族语言教育、教育文化改革——

蒙古贞夫（东京学艺大学）

吴斯琴高娃（东京都立大学）

包通力嘎（国士馆大学）

#### 浅析寺院教育对蒙古说书艺人养成所起到的作用

蒙古贞夫

纵观蒙古民族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史可以得知，诸多的蒙古说书艺人，即“胡尔沁说书艺人”（又称“胡尔齐”、或者“胡尔奇”）们，都曾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满族掌权的清朝，不仅在蒙古的各个地区大肆建造藏传佛教的寺院，而且还通过在其寺院内设置蒙古文学、语言、文字等等科目，进行教育教学，培养了无数有作为的青年文学家、翻译家、说书艺术家。

根据叁布拉诺日布所著的《蒙古胡尔齐三百人》，叁布拉诺日布·王欣合著的《蒙古说书艺人小传》，波特奇·高长胜·包文斌主编，董新国执笔的《享誉全国的乌力格尔之乡——科尔沁右翼中旗——》，李青松所著的《胡尔沁说书》，甘珠尔所著的《图什业图胡尔齐传》，冬青所著的《胡尔齐的摇篮——扎鲁特——》等专著的记载也可以佐证，早期的蒙古说书艺人都曾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事实。

例如，深受蒙古人民爱戴，具有“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的中兴之祖”之称，被认为是胡尔沁说书艺人鼻祖的恩赫特古斯艺人，对蒙古说书艺术的发展和传承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丹森尼玛艺人，蒙古贵族出身的朝玉帮艺人，多才多艺的琶杰艺人等胡尔沁说书艺人，都曾作为喇嘛入驻户籍所在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蒙古语和蒙古文字、藏语和藏文、梵语和梵文，满语和满文相关的知识。

但是，从现存的蒙古语，汉语，日语，英语的文献来看，大多数专著和论

文里都是用宗教学的观点来分析和阐释藏传佛教或者蒙古佛教形成的原因、历史沿革、亦或宗教流派的特点。很少有学者用民俗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视点分析寺院教育对蒙古说书艺人的养成所起到的作用。

因此，笔者以上述的6本专著为基础的同时，利用长期深入民间，对蒙古说书艺人及其民俗爱好者进行访谈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并论证寺院教育对蒙古说书艺人的养成所起到的作用。具体的实施方案如下。

首先，收集并整理与藏传佛教和蒙古佛教有关的书籍和史料的基础上，分析并论证寺院教育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

其次，利用收集到的相关史料，深入分析清代藏传佛教寺院里设置的课程内容，论证蒙古艺人养成的过程。

最后，统筹和归纳史料及其田野调查的具体内容，论证寺院教育对蒙古说书艺人的养成所起到的作用。

## 浅析含二重格蒙古语句子的日语翻译

吴斯琴高娃

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需要系统的学习格助词等语法项目。日语和蒙古语在形态上都属于黏着语，句子的语法意义通过附加的格助词来表现。一般来说，以蒙古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首先，从对比蒙古语和日语的相异点开始，再去理解日语的基础语法会更容易，运用起来也会更加准确。

例如，就像日语的格助词「から」和「より」，对应蒙古语的格助词词尾「ᠠᠨ」一样，比较学习日语格助词所对应的蒙古语的格助词，可以充分的了解格助词的相关用法。近年来，有关格助词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日本学者小林（1983）认为，“母语为蒙古语的日语学习者，在运用日语时容易出现“格助词误用”等现象，究其原因，是受到母语蒙古语的影响较多。

另外，乌云其其格(2016)在论文中指出，“对于造成如此频繁出现误用格助词的原因是，因为蒙古语的格助词和日本格的助词有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

浅川·竹部(2014)也提出,“日语的格助词和格助词是不能互相重叠使用的”等观点。

但是,在蒙古语中,有格助词叠加使用,即“二重格”的特殊现象。因此,笔者在调查了解关于母语为蒙古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如何翻译含有二重格的蒙古语句子时发现,很有可能大多数人的翻译水平是受到日语能力高低影响的。

所以,在此次的发表中,笔者将调查对象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为“日语能力考试2级合格者”和“日语能力考试3级合格者”进行比较,观察、分析、论证有关“含二重格蒙古语句子的日语翻译”问题。

##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改革分析

包通力嘎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式发展,国民生活也大幅度提升,大量农牧民居住区逐渐变化成城镇。这必然会导致传统的农牧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产生矛盾冲突。随着当前农村牧区城镇化进程不断的拓展,这种矛盾也在不断地被激化,部分地区尤为凸显,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外来文化冲突十分强烈。

针对这种状况,为了保持两个文化的平衡点,相互适应与融合,就必须调整教育的方式与内容。借助教育这个文化传播方法,让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更容易地接收其他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差异。使其在民族文化继承的基础之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从而培养出符合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人才。如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方式与内容不合理,必然会导致当地人们的排斥心理,文化上的停滞不前,从而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地方,受到地理因素、自然条件、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处于半封闭式现状,与外界之间无法深度的交流融合。

教育本质是实现文化的传播,确保文化的接受主体能够认可外来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给自己血液循环,更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只有对教育的方式与内容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发展和民族融合。科学的分

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人才需求，民族文化的特点，优势与不足才能针对性的制定教育政策，培养人才，使其最后达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

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普遍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地区原有的居住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使原本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在各层面都产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城市的逐步发展，小城市的不断形成，使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交通运输也越来越现代化。原有的半封闭式文化也更广面的接触外来文化。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思想、习俗、观念、教育等多方面都造成影响。

针对此种社会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转型，由原本的单一化封闭状态，逐步转变成为复合型开发状态，民族地区的社会功能如何更好的交接于社区文化功能，这些都是现阶段社会生活所出现的新问题。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现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整体教育还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教育的文化适应性也正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相应的社会职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并未加大整体的重视力度，由此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农牧区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面临着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基于物质环境、风俗习惯或者是心理层面，都无法更好地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有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保证其更好地走向与先进文化的交融与保留原有文化的特色。

### 参考文献

1. 参布拉诺日布主编 章红翻译 〈蒙古胡尔齐三百人〉 《哲里木盟文学艺术研究所》 1989.
2. 佟宝山 李品青 主编 〈阜新蒙古史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
3. 参布拉诺日布 王欣共著 〈共著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 《辽沈书社》 1990.
4. 李青松 著 〈胡尔沁说书〉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5. 波特奇 高长胜 包文斌 共著 〈享誉全国的乌力格尔之乡—科尔沁右翼中旗—〉 《远方出版社》 2004.
6. 冬青 主编 〈胡尔齐的摇篮—扎鲁特—〉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少儿出

- 版社》 2010.
7. 甘珠尔 主编 〈图什业图胡尔齐传〉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8. 小林幸江 〈モンゴル人学習者の作文にあらわれた誤用例の分析—格助詞に関する誤用について—〉 《日本語学校論集》第10号 44-53 1983.
  9. 浅川哲也 竹部歩美 〈歴史的变化から理解する現代日本語文法〉《おうふう》 2014.
  10. 乌兰其其格 〈蒙古族大学生学习使用日语格助词的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7.

# 医疗福祉教育分科会报告

## 自闭症患者在自闭症设施中的护理以及护理教育的课题

李剑（神奈川県立保健福祉大学）

刘佳琦（社会福祉法人けやきの郷）

### 引言

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特殊发育类障碍疾病。通常伴有语言交流障碍，不善于社交，同时表现出例如不厌其烦地看地图和时间等反复多重行为模式。自闭症会非常固执地执行自己的“生活习惯”（癖好），缺乏通融变通，所以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了解并且去适应新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事。对外界的刺激感到敏感以及难以与他人分享情感和兴趣。

目前还没有可以彻底治愈自闭症的方法，但对于儿童早期的自闭症，通过接受个别或者集团的疗育，对患儿的对人关系的发展促进和增加适应力有一定帮助。自闭症儿童在长大成人后可以独立生活的还很少。现在日本有一些服务于自闭症患者，为他们提供对人机能训练或者包括日托等托管服务的康复设施，中国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对处于任何发育阶段的自闭症患者来说，能够得到周围人的支持并有稳定的支援他们的环境尤为重要。

### 报告

本次分科会主要围绕“对自闭症患者的护理”这一主题，讨论了从儿童期到成年期自闭症患者的护理支援以及在人才育成中的护理教育的课题。分科会包括主讲人在内一共有 10 余人参与了讨论。其中参会者中既有自闭症设施的经营者（管理者），也有在自闭症设施实际参与照护的护理员，有研究自闭症患儿保育与教育的专家学者、也有熟悉自闭症儿童治疗与支持的儿科医生、大学护理系小儿护理学的老师，以及涉及特殊儿童疗愈的老师等。

在分科会中，刘佳琦氏以日本的成人自闭症设施为例做了详细的关于照护自闭症人群的日常的介绍。其中谈到“集团自立-无论残障程度如何，相互支持

走向自立”的设施理念让笔者印象深刻。在日本的自闭症设施（设施的单位为“所”）中自闭症者被称之为“用户”而非“患者”，在“用户”的入所（以下为‘自闭症用户’）生活中，自闭症用户通过执行各种任务，比如参与一些生产制作活动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同时得到相应的收入。在生产制作活动之外，设施的工作人员会安排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以及休闲活动。

设施中照护自闭症用户的工作人员主要为护士和护理员，护理员在日本称之为“生活支援员”，主要负责自闭症用户的生活起居等日常介护支援工作，而护士则主要负责用户的健康管理，其中包括对用户的日常身体体征的把握，服药管理，感染症预防，医务室的管理，定期体检，生病看病时的同行与日程调整，与主治医师的沟通与联协等。也包括一些医疗处置，比如管饲、吸痰、褥疮治疗和预防、皮肤护理、导尿、摘便、血糖水平测量、胰岛素注射，还包括疫苗接种计划、健康检查计划（尿检、粪便检查、采血）、牙科检查计划以及整个设施的卫生管理、员工健康管理和旅行陪同等。此外他们还负责对应自闭症用户家属的咨询，与其他专业人员的联协合作与咨询。其他专业人员包括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营养师、言语治疗师、假肢师等。

针对成人自闭症患者的护理我们主要围绕设施中对他们的生活援助支持以及护理的现状进行信息共享，最后分科会重点讨论了介于成人自闭症设施中的护士的业务培训以及涉及到的护理教育中的课题等。

从共同探讨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在对比于医院里通常有的系统完整的在岗业务培训，自闭症设施中的护士的在岗培训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从设施中的人员配比来看，护理员人数多护士人数少，有的设施里仅配有1到2名护士，而如以上的繁杂的业务内容以及自闭症患者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护士的工作量十分繁重。在护理教育中，虽然有关于自闭症(小儿自闭症)理论知识的学习，但是许多大学在小儿护理的实习中并没有涉及到或者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去过自闭症设施实习，这将是一个护理教育中的一个新的课题。

## 结语

本分科会讨论了对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对自闭症的支援，尤其着眼于成人

自闭症设施。在本次分科会的讨论中我们不止谈及了自闭症入所用户的生活支援情况，医务人员和支援人员的工作内容等，其中也有自闭症设施经营管理者分享了自己对用户需求的见解以及宝贵的运营经验等，最后我们在如何致力于在自闭症设施中培养护士这一课题中，共同思考了护理教育的未来。